

# 论周恩来的非洲政策理念

张 象<sup>1</sup> 薛 琳<sup>2</sup>

(1、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2、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教学科研部,陕西 延安 716000)

**摘 要:**周恩来总理为缔造中非友好关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非洲理念奠定了中国对非洲外交政策的基础。周恩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树立了中国与非洲是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认识,为了确定新中国对非洲政策,他又多次亲赴非洲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本文通过阐述周恩来非洲政策理念的形成、发展、要点及其典型实践,旨在为今天我们发展中非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些许历史智慧。

**关键词:**周恩来;非洲理念;中非友谊;中非关系

**中图分类号:** K8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5X(2016)02-0005-10

**Premier Zhou Enlai's Concept on China's African Policies**

ZHANG Xiang<sup>1</sup> XUE Lin<sup>2</sup>

(1、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Yan'an, Yan'an 716000, China)

**Abstract:** Premier Zhou Enlai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His concept on African policie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China's diplomatic policies towards Africa. As a Marxist, Premier Zhou Enlai has long established the idea that China and Africa have forme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African policie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emier Zhou Enlai went to Africa for many times for field researches. This paper will elaborate on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key points and practice of Premier Zhou Enlai's concept on China's African policies to provide historical wisdo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t China - Africa strategic partnership.

**Key words:** Zhou Enlai; concept on African policies; China - Africa friendship; Sino - African relations

非洲是世界第二大洲,有“自然资源聚宝盆”之称,它地跨南北半球,扼东西方交通要冲,有54个发展中国家和近10亿人口。非洲对全球经济、政治乃至生态环境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非洲已完成民族独立大业,与我国一样正在实现伟大的“复兴梦”。中国需要非洲,非洲也需要中国。在此新形势下,我们更加怀念周恩来总理,他为中非新型关系和中非人民传统友谊的缔造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重温他的非洲政策

理念,对于中非关系的新发展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目前学界有关周恩来外交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对他非洲政策理念的研究尚属软肋。故我们写出此文,以求得到同仁们的指正。

## 一、周恩来怎样看非洲

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出于对殖民主义列强的憎恨,就十分同情被压迫的非洲黑人。有一天,当他读到奉天《盛京日报》上有殖民者奴

役、贩卖黑奴的消息时,十分气愤,大声地说:“黑奴总有一天要解放!”<sup>①</sup>

1920—1924 年周恩来旅欧勤工俭学,接受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成为共产主义者。从此,他有了革命的唯物史观,对非洲黑人民族由感性的同情开始转化为理性的支持。1920 年 7 月,共产国际召开“二大”,通过了列宁起草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报告》。列宁指出: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世界民族被分割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人数少却拥有财富和实力的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占世界 70% 左右的被压迫民族。列宁不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sup>②</sup>。周恩来通过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及时了解、接受了列宁这一思想。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除了关注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之外,也十分关注非洲埃及正在进行的反英运动。埃及是非洲的文明古国,从 1798 年起遭受殖民主义侵略,1869 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从半殖民地沦为英国殖民地。1919 年掀起爱国反帝运动,迫使英国承认埃及形式上独立,废除“保护权”。1922 年 2 月,周恩来以《伦敦通信》的形式通过天津《益世报》向国内报道了这一事件,揭露英国殖民主义的罪行,表示对埃及民族解放运动及其领导人扎格鲁尔的同感和支持<sup>③</sup>。1924 年他在《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一文中,表述了他的理念“我们心中不容丝毫忘掉与我们受同样苦痛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亦即是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并且我们若认清事实,果想将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我们也非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来打此共同敌人不可。故我们的救国运动乃必须建立在国际主义上面。”<sup>④</sup>

所以,周恩来的非洲政策理念,从一开始就有两个要点:一是中国与非洲同属被压迫民族,同受西方殖民主义者欺凌,是天然同盟者;二是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要奉行国际主义的关怀,并支持他们改变命运的斗争。

随着历史的发展,周恩来的这一理念不断完善。20 世纪 30 年代法西斯主义猖獗,这是现代帝国主义的极端派。他们妄图奴役世界,首先从

亚非国家开刀。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意大利法西斯 1934 年在非洲东北部挑起“瓦尔瓦尔绿洲”事件,1935 年全面侵占埃塞俄比亚(时称阿比西尼亚)。1937 年 11 月意大利加入“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承认伪“满洲国”,支持日本侵华战争。面对共同遭遇,刚刚结束长征的周恩来关注着非洲事变,声援埃塞俄比亚的抗意战争,在其关注下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报道了埃塞俄比亚反抗意大利侵略斗争的情况,进行声援<sup>⑤</sup>。

反法西斯战争的现实,使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主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1938 年 9 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sup>⑥</sup>周恩来于 1941 年 6 月专门撰文阐述共产党的这一主张,他说“中国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矛盾,也不冲突。国际主义者在中国必须坚决实行中国民族主义,才能使中华民族得到独立解放,走上国际舞台。同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必须同情和联合国际主义的运动,才能共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求得国际上真正的民族平等,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sup>⑦</sup>所以,这时周恩来的国际主义理念,不仅是国际支持,而且

<sup>①</sup>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 1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 页。

<sup>②</sup>《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6 页。

<sup>③</sup>《继爱尔兰之起者埃及》,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7—312 页。

<sup>④</sup>《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 455 页。

<sup>⑤</sup>《从阿比西尼亚的胜利说到中国能不能抗日?》,《红色中华报》1935 年 12 月 6 日,第 4 版《阿比西尼亚人民继续进行对意抗战》,《红色中华报》1936 年 8 月 9 日,第 1 版。

<sup>⑥</sup>《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07 页。

<sup>⑦</sup>《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崔奇主编《周恩来政论选》上册,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18 页。

注重这种国际间援助要与双方的民族愿望、民族利益相结合,这样的国际主义才会有实效。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等民族主义政党发来贺电。同年冬,亚澳工会会议在北京召开,苏丹工会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sup>①</sup>。周恩来以自己的非洲理念回敬他们,并指示中国的宣传、舆论部门声援非洲人民反抗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sup>②</sup>。1951年周恩来发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地位和作用》的谈话,论述了支援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意义,他说:“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当前革命的主要力量,我们不能低估这个力量,也不能认为这个力量只是辅助的力量。……我们的任务就是支持、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sup>③</sup>次年,他在一次讲话中将“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团结和支持,进一步确立为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方针之一<sup>④</sup>。1950年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干涉,西方大量的武装人员和军用物资通过苏伊士运河运抵朝鲜。日美安保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卫条约等军事同盟的相继建立,形成了对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包围圈。如何突破包围?与非洲国家的关系非常重要。而1955年召开的亚非会议为中国提供了机遇。

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接触到了当时非洲仅有的6个独立国家的政府代表和多个非洲民族主义政党代表,这使他对非洲的认识更为深入。这些国家面对两极对立的“冷战”形势,都奉行“中立”政策。它们“反帝、反殖”的立场受到了周恩来的重视,但是,它们又对社会主义国家存有疑虑。4月15日,周恩来赴会途径仰光时,特意在机场迎接了埃及领导人纳赛尔——当时非洲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并同他就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和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入沟通<sup>⑤</sup>。埃及1952年“七月革命”促进了北非民族独立运动高潮,但没有解决苏伊士运河主权问题。周恩来同纳赛尔的会晤是对非洲的一次很好的调查研究,为他在亚非会议上的发言做了准备。4月19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时,首先强调“近代以来,亚非两洲的大多数国家在不同

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迫,以致被迫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停滞状态。我们的呼声受到抑制,我们的愿望受到摧残,我们的命运被旁人摆布,因此我们不得不起而反对殖民主义。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受到的灾难和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使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容易互相了解,并在长期以来就深切地互相同情和关怀。”<sup>⑥</sup>当会议上有人挑起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争议问题时,周恩来再次用亚非人民共同命运的理念来说服他们,强调亚非国家必须要相互了解和尊重。会议《最后公报》也吸收了周恩来的观点,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写道“亚非会议考虑了亚洲和非洲国家有共同利害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且讨论了它们各国人民可以用来实现更充分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合作的办法。”<sup>⑦</sup>

20世纪60年代初“非洲觉醒”是震惊世界的大事件,仅1961年就有17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这一年被称为“非洲年”。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和全非人民大会相继召开。1963年5月25

<sup>①</sup>《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世界公联执行局委员及亚澳工会会议各国代表》,《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7日,第1版。

<sup>②</sup>关于新中国早期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关注,参见《意大利殖民地的前途》,《人民日报》1949年12月9日,第4版;《西非民主联盟被禁闭领袖在狱中绝食抗议》,《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3日,第4版。关于周恩来支持种族平等运动的论述,参见廉正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另外,在1950年,毛泽东以国家主席名义发表通电支持南非人民的正义斗争,参见《支持对南非联邦政府的抗议》,《人民日报》1950年7月27日,第1版。

<sup>③④</sup>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7、51页。

<sup>⑤</sup>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页。

<sup>⑥</sup>《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书面发言》(1955年4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2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sup>⑦</sup>《亚非会议最后公报》(1955年4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2集,第99页。

日非洲统一组织成立,非洲国家开始用一个声音说话。以埃及和加纳为代表的非洲国家参加了不结盟运动,大大壮大了第三世界的力量,使之在世界舞台上不可忽视。由于中苏分歧的扩大,越南战争和中印边界冲突的相继爆发,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C”型包围,中国也需要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关系以打破僵局。于是周恩来三次访问非洲,为中非首脑外交开创了范例。特别是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历时53天的“非洲十国之行”,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他在出访中具体地阐述了他的非洲政策理念,也通过实地考察加深了对非洲的了解。在第一站开罗,他对记者说“我们不是来得太早了,而是来得太晚了。”言外之意,我们是老朋友了,应该早点来。他接着说“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与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sup>①</sup>有国外学者评述周恩来此行的目标是:(1)寻求朋友,争取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支持者;(2)修复因中印边界冲突而产生的国际消极影响;(3)将中国确立为第三世界真正的支持者;(4)寻找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外的贸易伙伴<sup>②</sup>。此种分析虽有道理,但不全面,它没有理解到周恩来此行的更深层次意图——通过实地调研完善他的非洲理念,为中国对非政策奠定基础。

从埃及到索马里,每访问一个国家,周恩来都要结合被访问国的实际情况讲述非洲政策理念的三个观点:一是,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有着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共同经历”、“共同苦难遭遇”;二是,今天中非人民仍有继续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改变贫穷落后状态的“共同愿望”和“共同任务”;三是,中国与非洲必须加强团结合作、相互支持、相互鼓舞,这是共同的“根本利益所在”<sup>③</sup>。在非洲之行的最后一站索马里,周恩来全面地阐述了上述三个观点,他说“中国人民同非洲人民虽然语言不通、相隔万里,但是,我们有着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共同经历,有着反对帝国主义、建设自己国家的共同斗争任务,我们之间是最容易彼此了解的,

我们的感情是交流在一起的。”<sup>④</sup>周恩来对非洲的未来充满希望,他坚信“非洲人民一定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在这个辽阔富饶的大路上,画出最美丽的图画,写下最壮丽的诗篇。一个没有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独立自主的新非洲是一定会出现的。一个经济先进、文化先进的繁荣富强的新非洲是一定会出现的。”<sup>⑤</sup>

1965年3月至4月周恩来再次访问阿尔及利亚和埃及,6月又访问了坦桑尼亚。在此后的10年间,他接待了众多来华访问的非洲代表团,向他们传递自己的非洲理念。即使在1974年到1975年他病重期间,仍接见了大量来华访问的非洲朋友,表达他对非洲事业的重视。1974年9月26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了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称赞他们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是非洲国家楷模<sup>⑥</sup>。他用实际行动宣示自己的非洲理念:中国要重视非洲,坚信中国与非洲同命运、同期望,中国与非洲是最可靠的同盟。

## 二、周恩来怎样对待非洲

1957年加纳独立,点燃了撒哈拉以南地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烽火,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建立后,非洲独立国家从50年代的6个发展到33个。不过形势是十分复杂的。在“非统”成员中,当时只有12个与新中国有外交关系。非洲新独立国家的领导者多为民族主义知识精

<sup>①</sup>《周恩来总理在开罗举行记者招待会》(1963年12月20日),人民出版社编《亚非人民反帝大团结万岁》,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页。

<sup>②</sup>Emmanuel John Hevi, *The Dragon's Embrace: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Africa*, London: Pall Mall Press, 1967, pp. 142—144.

<sup>③</sup>参见人民出版社编《亚非人民反帝大团结万岁》,第8、99、129、152页相关内容。

<sup>④</sup>《周恩来总理在索马里摩加迪沙群众欢迎大会上的讲话》(1964年2月3日),人民出版社编《亚非人民反帝大团结万岁》,第246页。

<sup>⑤</sup>《周恩来总理向几内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发表的告别词》(1964年1月26日),人民出版社编《亚非人民反帝大团结万岁》,第186页。

<sup>⑥</sup>廉正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4卷,第153页。

英和爱国军人,他们虽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但他们受的教育和价值观仍是西方的。他们对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存有戒心。非洲革命的性质仅属民族革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并不突出,这与中国革命有着很大差别。非洲的传统势力——酋长与王公贵族既受殖民者摧残,又受其扶植,政治态度兼具斗争与妥协两面性,他们能接受新的政权。非洲独立国家的政治体制更是多种多样,有的保持君主制,有的是军人专制,有的是民族主义政党领导的共和制,效仿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

这时期西方殖民国家对非洲的政策也多种多样。它们在有的地方奉行武装镇压方针,有的地方则进行退让改革。英国推行“宪制改革”,法国搞“非殖民化”措施,美国打着“反殖民主义”的旗号,进入非洲。这使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后仍与西方集团保持着密切联系。它们对新中国的关系,有的热情,有的则顾虑重重,继续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

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周恩来从其非洲理念出发,运用自身的丰富革命经验,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对非洲的政策。

他首先把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运用到非洲,团结非洲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与毛泽东就一起积极构筑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明确指出外交工作就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友国,孤立极少数敌对者,……使国家有一个长治久安的国际环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sup>①</sup>为此,新中国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要团结争取”,要和它们“做朋友”,“不能采取敌对态度,不要把它们挤到敌人的营垒里去”<sup>②</sup>。

在出席亚非会议之前,周恩来将相关与会国的政治态度分为四类,即:甲、和平中立国家;乙、接近和平中立国家;丙、接近反对和平中立国家;丁、反对和平中立国家。将与会的6个非洲国家,埃及、苏丹、加纳划为乙类国家;利比亚、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划为丙类国家。根据这样的分析,依据扩大和平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周恩来提出了“团结甲类国家、争取乙类国家、影响丙类国家、孤立并分化丁类国家”的基本政策,强调

在非洲国家中,重点做埃及的工作,争取“建交或建立事务关系(例如互设商业机构)”<sup>③</sup>。

周恩来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对朋友必须要真诚,过去搞革命如此,现在搞外交更要这样。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坚决反对新老殖民主义,遭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忌恨。1964年1月20日,周恩来访问加纳时,突然发生了谋刺恩克鲁玛致伤事件。要不要按原计划访问呢?周恩来坚定地说:越是在人家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去,要支持。为了照顾主人的安全,周恩来打破礼宾常规,主动建议恩克鲁玛不必到机场迎送,访问期间的一切活动都在总统所住的城堡中进行,并劝恩克鲁玛不必到宾馆回拜。这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作风,使对方深受感动。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建议恩克鲁玛:要有一个领导核心、要有一支可靠的军队、要有适当的经济政策<sup>④</sup>。周恩来对待恩克鲁玛的这种真诚态度被传颂为外交史中的佳话。

周恩来认为同非洲国家交往要坚持“求同存异”原则。这是他在万隆会议上领悟到的同民族主义国家交往时的一项重要外交原则。当时,面对各国分歧,周恩来说道“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sup>⑤</sup>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搁置一边,“求大同,存小异”是能达成一致协议的<sup>⑥</sup>,他将此经验用在非洲。

在非洲十国之行中,周恩来更具体地运用和发展了这一经验。例如,访问突尼斯时,布尔吉

<sup>①</sup>裴默农《从中巴关系看周恩来争取友好邻邦的远大谋略》,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sup>②</sup>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1—53页。

<sup>③</sup>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60页。

<sup>④</sup>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11页。

<sup>⑤</sup>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3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250页。

<sup>⑥</sup>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76—477页。

巴总统在宴会讲话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若干异议,特别是如何认识美国与中国的观点不尽相同,一时气氛很紧张。周恩来泰然自若,当场做了圆满答复,他说“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的问题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我们总是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求同存异,并且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加强努力的。”<sup>①</sup>他的讲话博得一片掌声,布尔吉巴非常满意,出现谈笑风生、极为融洽亲切的场面。第二天,双方便宣布建交。代表团离开时,欢送的规模特别盛大,外国报纸评论:这是中国总理的胜利<sup>②</sup>。

周恩来认为坚持“求同存异”的目的是要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在同非洲记者谈话时,明确指出中国是按照“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sup>③</sup>与非洲国家友好相处的。周恩来访问埃塞俄比亚时,该国尚未同中国建交。海尔·塞拉西皇帝希望周恩来访问,但又迫于美国压力,表示不在首都接待周恩来。按照国际惯例,这是不礼貌的。然而周恩来着眼于发展中埃友好关系,并不计较这些外交礼仪。不仅如此,为了照顾老皇帝的顾虑,周恩来在答谢宴会上不讲话,而是将讲话稿送给他,以便其能了解中国的立场和政策,妥善处之。海尔·塞拉西对此甚表感谢,一再表示要与中国建交,终于在 1970 年 11 月 24 日,埃塞俄比亚宣布正式同中国建交。

周恩来对非洲的外交虽然十分灵活、务实,但在原则问题上,他是绝不松动、妥协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少非洲国家受其影响。它们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同时,也想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对此周恩来是绝不退让的。例如,塞内加尔首任总统桑戈尔是反殖民主义的著名人物,也是非洲的著名诗人,曾提出“黑人传统精神论”,在非洲大陆颇有影响<sup>④</sup>。他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曾多次派代表团访华。新中国于 1961 年就承认其独立,但由于它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就一直未答应其建交要求,直至它与台湾在 1971 年断交后,才与其建交。这一事例反映了周恩来非洲理念的原则性。为了帮助那些与台湾断交的非洲国家,减少因台

湾农耕队撤离后产生的损失,周恩来指示:不能让这些非洲受援国因为与我们建交而受经济损失,只要他们升起五星红旗,降下青天白日旗,我们就要尽快派出专家顶替台湾农耕队,而且还要比台湾搞得更好<sup>⑤</sup>。

### 三、周恩来论怎样援助非洲

殖民主义的长期剥削造成了非洲国家贫穷落后,新生的非洲国家都迫切需要外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殖民主义正是利用这一点,打起“援助”的旗号,向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不发达国家进行渗透。美国总统杜鲁门 1949 年发布了“第四点计划”,国会据此通过了《对外经济援助法案》,同时还以“军援”的名义,借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西亚、北非国家设立军事基地。英法老牌殖民者也“效仿”这一办法,“大英帝国”成了“英联邦”、“法兰西帝国”成了“法兰西共同体”,它们打着“合作”与“军援”的幌子,对成员国继续进行控制。有的成员国接受了这些,有的则坚决反对。例如,非洲社会主义者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就曾说“宁要贫困的自由,不要富足的奴役。”<sup>⑥</sup>新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应该如何办?如何区别于西方殖民主义的所谓“援助”?这是我国与非洲国家交往的一项重要课题。

新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从埃及开始的。西

①《周恩来总理在布尔吉巴总统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1964 年 1 月 9 日),人民出版社编《亚非人民反帝大团结万岁》,第 96 页。

②《周总理亚非十三国之行——外国报刊通讯社的评论》,《人民日报》社编《五洲的怀念》,人民日报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39 页。

③《周恩来总理在开罗举行记者招待会》(1963 年 12 月 20 日),人民出版社编《亚非人民反帝大团结万岁》,第 17 页。

④张象《塞内加尔、冈比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53—355 页。

⑤程飞《“老外经”心中的周恩来总理》,商务部网站 <http://lgj.mofcom.gov.cn/aarticle/c/200606/20060602420693.html>。

⑥陈公元主编《非洲风云人物》,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3 页。

方大国为了报复 1952 年埃及“七月革命”的反殖运动,针对埃及依赖棉花出口的单一经济特点,对其施加经济制裁,拒买或减购棉花,致使埃及棉花严重滞销,经济受到重创。为帮助埃及渡过难关,1953 年周恩来指示外贸部门,在中埃尚未建交且中国也不需要进口棉花的情况下,购买埃及的棉花和棉纱<sup>①</sup>。此举赢得了埃及人民的友谊。1956 年 5 月 3 日,埃及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同年 9 月 19 日,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伙同以色列于 10 月 29 日出兵对埃及发动进攻。在战争期间,中国又给予埃及物资援助,提供豆类、牛羊肉及其他物资,并赠送 2000 万瑞士法郎现金,以解燃眉之急<sup>②</sup>。

自 1954 年起,阿尔及利亚开展了反对法国殖民的武装斗争。1958 年,阿尔及利亚人民组建临时政府,中国无偿提供了大量援助。该国革命领导人布迈丁高度评价说:“在革命斗争的岁月里,阿尔及利亚战士用的枪炮、盖的毛毯、穿的衣服都是中国送的。”<sup>③</sup>1958 年几内亚宣布独立,法国对其进行经济制裁,中国也给予了几内亚无偿的食品和资金援助。1960 年,中国政府邀请杜尔总统访华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转年又同加纳、马里签订了类似协定。所以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时首先要到这些国家访问,考察我国援助的实际情况<sup>④</sup>。

周恩来依次到各受援国调查中国援助的效果,设身处地的为受援国考虑,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援非的原则。1964 年 1 月 14 日,周恩来同恩克鲁玛专门探讨此问题,公开提出了八项原则的方案,并通过加纳通讯社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公布于世,听取反映。1 月 20 日,周恩来在同马里总统凯塔会谈后,正式将“八项原则”的全文写入了 1 月 21 日发表的《中国和马里的联合公报》,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

从理念上分析,八项原则有三大特点:第一,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传统的国际主义理念,是在新形势下的创新和运用。这种援助与“大国恩赐”绝然不同,它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有机结合,是溶入了双方民族主义利益和任务的国际主义。正如,第一项规定“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

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这里的“相互”是国际主义的体现,“平等互利”是民主民族主义的反映;最后一项规定,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要像当年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那样,“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sup>⑤</sup>。周恩来反复告诫大家,我们与非洲国家是同命运的伙伴关系。我们援助了它们,它们也援助了我们。中国是大国,是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在援助、支持弱小国家时多一些担当是应该的。即使暂时看不到回报,但回报最终是会有,因为非洲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的和平发展、复兴繁荣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非洲大陆的复兴有利于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这对中国来说就是最大的回报。7 年后,在 1971 年第 26 届联大上,新中国以压倒多数的 76 票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其中非洲国家占了 25 票,约 1/3。这是回报中国援助的最好例证。

第二,援助要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老殖民主义体系崩溃,“新殖民主义”粉墨登场。无论是“新殖民主义者”的“经济合作”,还是美国“反殖民主义”的“美援”,都是有附加条件的。美国在非洲首先援助的是有其军事基地的国家和美苏争霸的关键国家,例如,“非洲之角”和某些中、南非洲国家。这种“经援”、“军援”、“技术援助”都是以牺牲这些受援国主权为代价的。新殖民主义的“英联邦”和“法兰西共同体”与成员国签订有条件的相互“合作”与“援助”协定,继续控制这些

<sup>①</sup>王成安《中非关系中的七件大事》,陈公元主编:《中非关系回顾与思考: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成立 30 周年特集》2010 年内部出版,第 66 页。

<sup>②</sup>张忠祥《略论 1956—1965 年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历史教学问题》1997 年第 5 期,第 15 页。

<sup>③</sup>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5 页。

<sup>④</sup>吴兆契主编《中国与非洲经济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1—42、158 页。

<sup>⑤</sup>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611 页。

非洲国家的经济命脉,无偿或以极小代价获取其资源,并享有军事和外交特权。中国“八项原则”与之全然不同,提出“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sup>①</sup>就连外国学者也承认,对受援国主权的尊重是中国援助的最大特点,这是中国同西方国家“援助”的根本差别<sup>②</sup>。

第三,中国援助追求实效,惠及民生。周恩来多次指出援建项目要“符合当地实际”,并强调“这是援外建设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sup>③</sup>。“八项规定”中的第二项“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第六项“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和第四项“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清楚地展现出中国援助的这一特征。为此,我国的援建项目通常是“采取因地制宜,以中、小为主和土洋结合的方法,帮助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sup>④</sup>据当年陪同周恩来访问非洲的黄镇大使回忆: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马里时,十分注意帮助解决人民生活必需品,便向马里派去了茶叶专家,帮助马里人民种植和炒制茶叶<sup>⑤</sup>。马里总统凯塔深受感动,他说:中国人民宁愿自己过简朴生活,省出钱来支援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和不发达国家的建设。今后马里要尽一切努力帮助中国同马里的邻国发展友好关系<sup>⑥</sup>。坦赞铁路是中非友谊的丰碑,周恩来作为这条铁路的核心决策者和最高执行者,不仅明确指出“援助项目的设计必须适合当地的条件”,更多次强调:在铁路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训练好技术人员和工人,使受援国人民掌握全套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sup>⑦</sup>。坦桑

尼亚总统尼雷尔称赞中国援助道“援助的目的应该是真正用来造福人民,而你们的援助就是这样的。”<sup>⑧</sup>

#### 四、周恩来论怎样研究和学习非洲

非洲的发展相对落后,非洲独立时间相对较晚,可以向非洲学习的问题,不大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但为了发展中非关系,周恩来十分重视对非洲问题的研究和学习工作。他一向主张:为了进行外交活动,首先必须学习,由学习进入活动<sup>⑨</sup>。学习非洲是开展对非洲国家外交的前提,历史和地理的诸多原因,我们对非洲了解的实在太少了。在1960年6月,周恩来同刚果的朋友会谈时坦言说“你们来很好,要不来我们对你们情况就不知道。我们对非洲知道得很少,很抱歉。”<sup>⑩</sup>次年4月27日,毛泽东主席会见非洲外宾时也讲道“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

①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11、325页。

②John Franklin Copper, *China's Foreign Aid: An Instrument of Peking's Foreign Policy*, Lexington: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76, p. 271.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24页。

⑤黄镇《把友谊之路铺向觉醒的非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67页。

⑥陆苗耕《毛泽东主席对中非关系的历史性贡献》,陆苗耕编《同心若金——中非友好关系的辉煌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⑦《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第一次会谈记录》(1965年2月18日)、《周恩来同赞比亚副总统卡曼加第二次会谈记录》(1966年8月20日)、《周恩来会见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赞比亚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70年7月9日),参见《关于中国政府援助修建非洲坦赞铁路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

⑧《周恩来与尼雷尔第二次会议记录》(1968年6月21日),参见《关于中国政府援助修建非洲坦赞铁路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

⑨郑锦炯、刘祺宝《周恩来与外事调研》,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第299页。

不算清楚。”<sup>①</sup>领袖们这种实事求是的谦虚态度着实令人感动。周恩来的非洲十国之行被誉为“三寻求之旅”，即：寻求知识之旅、寻求友谊之旅、寻求和平之旅。他在第一站埃及就表示：此行是为了多了解一些非洲知识，多学习一些非洲知识<sup>②</sup>。此后每访问一站他都要表达这一动机。回国后，他又叮嘱那些出访非洲的人员，注意学习非洲。

要怎样学习和研究非洲呢？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主张首先要进行基础研究和知识普及工作。要从建立研究机构、培养专门人才入手。毛泽东专门指示“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可以编写一本简明的书，不要太厚，有一二百页就好。”“内容要有帝国主义怎么来的，怎样压迫人民，怎样遇到人民的抵抗，抵抗如何失败了，现在又怎么起来了。”<sup>③</sup>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于1961年7月成立，并着手编印了《亚非译丛》、《亚非问题参考资料》、《非洲地理资料》等内部期刊。世界知识出版社也于1962年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介绍非洲情况的入门书——《非洲手册（概况部分）》。

1963年年底，周恩来亲自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就加强对外国问题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座谈，并于会后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不久，该报告和毛泽东“这个文件很好”<sup>④</sup>的批语一起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3]866号）的名义下发全国<sup>⑤</sup>。根据文件指示，国内多处专门研究非洲问题的机构相继建立起来。北京大学于1964年4月成立亚非研究所，7月南京大学成立非洲经济地理研究室，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始讲授非洲课程。70年代初期，周恩来又指示有关部门翻译和出版了大批非洲史地著作，其中既有非洲各国历史、地理专著，也有全非洲和地区性的综合史地著作。

周恩来强调学习和研究非洲必须要转变观念，不要以为非洲受了几百年的殖民统治就什么都是落后的，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要学习非洲国家的长处，学习对我国建设有用的东西。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时，他参观了该国的现代化炼油

厂，向身边人员表示：在现代化采矿方面非洲企业走在我们的前面，有许多技术可以让我们学习，并强调：回国后一定要石油部派人来学习<sup>⑥</sup>。访问摩洛哥时，他发现该国桔子个大、皮薄、汁多、香甜可口。桔子源于中国，后来传播到世界各地，但因缺乏研究，品种长期得不到改良，品质已大大退化。他当即表示要派中国专家赴摩学习，并邀请该国专家来华讲学<sup>⑦</sup>。周恩来也十分注重中非文化交流工作。在他的直接关怀下，中国成立了东方歌舞团。这次访非回国不久，他就指示即将赴非洲演出的该团成员，“你们去不光介绍我们的文化，也要学习人家的文化”<sup>⑧</sup>。该团沿着周恩来的足迹访问了非洲，排演了大量反映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歌舞和音乐节目，很受当地群众欢迎。

周恩来强调要到非洲实地进行调研，获得第一手资料。他认为“对一个国家亲眼看看，要有益得多”<sup>⑨</sup>，“没有现场的感性知识，就没有法子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sup>⑩</sup>。为此他身体力行，在出访非洲十国的过程中，他不停地进行调查，深得非洲朋友的赞赏和积极回应。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在告别宴会上，向周恩来建议说要

①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65页。

②《周恩来总理在开罗举行记者招待会》（1963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阿尔及尔举行记者招待会》（1963年12月26日），人民出版社编《亚非人民反帝大团结万岁》，第15、67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8页。

⑤赵宝煦《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一点史料》，《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3期，第142页。

⑥黄镇《把友谊之路铺向觉醒的非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不尽的思念》，第370页。

⑦杨琪良《在摩洛哥王国的六年概忆》，编委会：《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60—61页。

⑧莫德格玛《东方歌舞团艺术家的成长——张均篇》，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⑨《周恩来同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会谈记录》（1963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

⑩《周恩来关于访问亚非欧十四国的报告》（1964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

“如实地了解非洲各国人民和政府及其领导人，了解他们所想的是什么，以便你能在你的总政策中，在你的国际活动中考虑到这个大陆。”<sup>①</sup>周恩来十分重视此建议，在同非洲领导人会谈时“有一半多的时间是在倾听”，而且回国后，又指示外交部、外贸部、对外文委等部门要派专人“到亚非地区特别是非洲去，站稳脚跟，长期工作”<sup>②</sup>。上述论述反映出周恩来对非洲问题研究的基本观点，即：了解非洲是从非洲人民的视角出发，而不是由我们的主观意图来进行，调查研究只能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入手，真正到非洲实地去获取第一手资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和非洲老一辈政治家共同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纪元。”<sup>③</sup>我们要发展他们的事业，学习、继承他们的思想。纵览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中国与非洲经历过共同的屈辱、反抗、解放和发展，不仅是“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更“历来是命运共同体”，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有着“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兄弟情谊”<sup>④</sup>。在今天，周恩来的非洲政策理念仍是发展中非关系的宝贵精神财富，让我们弘扬其理念，面对全球化和多样化的世界，与非洲朋友共同应对挑战与机遇，携手“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sup>⑤</sup>，再掀中非关

系的新篇章。

[本文为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重点基地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2014 年年度课题“中国对非洲文化外交的成效与影响研究”(FYZS20140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象(1934 - )，男，山西临猗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薛琳(1981 - )，男，天津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副教授，政治学博士。

责任编辑：汪谦干

①《布尔吉巴总统在周恩来总理举行的告别宴会上的讲话》(1964 年 1 月 10 日)，《亚非人民反帝大团结万岁》，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12 页。

②《周恩来总理访问十四国报告提纲》(1964 年 3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

③习近平《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26 日，第 2 版。

④《习近平在南非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让友谊、合作的彩虹更加绚丽夺目》，《人民日报》2015 年 12 月 2 日，第 1 版；杜尚泽、蒋安全《听，非洲的声音》，《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29 日，第 3 版。

⑤习近平《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5 年 12 月 5 日，第 2 版。